

上天责我开面目,创辟用启铸华章^{*}

——乐黛云先生访谈录

陈戎女

今年是乐黛云先生八十华诞。乐先生1948年选择北大读大学,1958年被划为极右派,70年代回北大,后来教欧美留学生中国现代文学,结识薇拉促成1981年的哈佛之行,1982年去了伯克利大学,1984年秋毅然回国垦拓国内的比较文学事业,1985年创建北大比较文学所,同年还成立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乐先生的个人经历伴随特定年代而沉浮,其治学历程也折射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当代学者的不幸遭际与成长艰辛。自80年代初期开始,乐先生从美国归来后,和季羨林、杨周翰等诸先生一起,将国内的比较文学几乎从零做起,发展到“燎原之势”(曾繁仁先生语)。乐先生以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近三十年所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鉴于此,《中国文化研究》委托本人对乐先生进行了采访。

一 研究比较文学的机缘与历程

陈戎女(以下简称陈):我代表《中国文化研究》和杂志的读者朋友们,敬贺老师身体健康、松柏常青!请乐先生简要讲述一下您几十年的治学历程。

乐黛云(以下简称乐):首先谈一谈为什么我会做比较文学,怎么开始做比较文学的。这个问题和一段历史相关,以前的访谈都没怎么涉及到。我们北大的一批教师1969年到江西鲤鱼洲走“五七”道路,1970年办了个工农兵大学,我当了中文系的“五同”教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改造。当时指定了十个“五同”教员,我也是其中之一。

工农兵大学就是鲤鱼洲的那个草棚大学。从江西大学把书弄到鲤鱼洲来是不容易的。为应付学生的埋怨,给学生上的第一课就是批“样子观”。当时我们大半年在井冈山,有时在鲤鱼洲上上课,我们十个教员,像严家炎、袁行霈、闵开德等就轮流上点儿课。到71年草棚大学就办不下去取消了,下半年我们就和学员一起回到北京的北大了。可是工农兵学员仍要“上、管、改”,“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回北大后,我经常带着学生去各个报社实习。我带着他们到石家庄报社、《北京日报》,常常一去就是三个月,然后还去大兴,边劳动边学习,实现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样大概又过了一年。这时教学和鲤鱼洲时的草棚大学差不多是一样的,仍然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同改造,所谓“五同”。但授课可以稍微系统一点了。比如说讲鲁迅,这时候就可以讲得系统一些了,不是抓住一篇讲一篇,而是从小说、散文系统地讲。

^{*} 本课题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陈: 当时你们可以依托什么资源呢? 可以用北大的图书馆吗?

乐: 图书馆是可以用的, 可是也没有真正的教材。谁讲这个课, 谁自己就有一个小系统。我们十个“五同”教员各带一个班, 下去实习。我一个人带了一个十个人的班, 跟这十个人感情特别好。我们在报社也是同吃同住, 在石家庄、大兴一起待了很久。一个教员带着十个学生可以说是到处流浪。别的教员也是一个人带十个学生到处走。我有几个学生是很要好的, 有张文定, 他个儿高, 是当时的排头兵。还有曹文轩, 在大兴我们一直在一起。他们中也有很优秀的。主要是靠他们自己学习。1971 年到 1976 年就是这么过来的。1976 年我就去教留学生了, 教了一个二十几人的朝鲜学员班。他们有专门的老师教汉语, 另外需要老师给他们讲中国现代历史和现代文学。我就承担这个任务。他们是二年级的学生, 语言很好, 因为另外还有很密集的汉语课。他们被管得非常严, 不能乱讲话。我也不能经常去找他们, 不能交谈。就是上课, 上完课我就走了。

陈: 所以您先是给朝鲜留学生上课, 后来才给欧美学生上课?

乐: 朝鲜学生教了一两年, 就是 1976、1977 年。大概是 1978、1979 年才开始教欧美学生, 那是第一届欧美学生。我做比较文学的契机就是从教欧美留学生班开始的。教欧美班, 我觉得不能只讲鲁迅、《金光大道》吧, 还得讲讲郭沫若、老舍、巴金、茅盾。一去备课, 就发现这些人受西方文学非常大的影响, 而尼采又特别突出。刘半农讲鲁迅, 说他“托尼学说, 魏晋文章”, 托尼就是托尔斯泰和尼采, 魏晋文章就是形式和风格师法魏晋。鲁迅本身就是中国和西方的一种结合。为什么我第一篇论文写的是《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呢, 一看资料, 茅盾在杂志《解放与改造》上连载过他自己选译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两章《新偶像》和《市场之蝇》, 并加以讨论。鲁迅翻译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在《新潮》上他译的《察拉图斯忒拉序言》连载过好多次。郭沫若在《创造周报》上也发表过翻译的《查拉图司屈拉之狮子吼》。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一个新天地, 必须要考虑国外影响的因素, 才能把中国现代文学讲通。除了外在的机缘还有内在原因。尼采跟我个人的心理也有关, 他的反抗性、重新评价一切, 让我一下子特别喜欢。那时候我阅读尼采也非常吃力, 也不是完全懂。克服了这些困难, 我写了《尼采与中国现代文学》。以前我写过什么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轮廓一类的, 都不算什么。这篇文章好比我的比较文学研究的发源地。

我自己在当右派之前就是做现代文学的。这时发现, 要做好现代文学, 必须要了解西方文学的发展, 和它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当时我对此深信不疑, 从此走上比较文学的路, 而且始终不悔。

陈: 好像考大学时您是被北大中文系点名要过去的。

乐: 沈从文先生欣赏我的作文, 我就阴差阳错地到了中文系。年纪大了, 发现这些历史的遇合就是这样转来转去。有些人讲, 你为什么搞比较文学, 是不是投机? 是不是觉得当时没人做这个, 比较文学发展会好你就去搞?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凭良心说, 我是做现代文学, 发现必须要了解西方文学, 必须要做两个文学的交叉, 这一点我是从看资料、从教欧美留学生的过程中逐渐觉悟的。也有人讲, 乐黛云西方文学也不好, 中国文学也不怎么样, 所以投机去搞比较文学, 好脚踏两只船。这真是很冤枉。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找一个什么东西来安身立命, 何来投机之念。

做学问要“与时俱进”, 可是, 与时俱进的界限是绝不“随风起舞”。这是两个不同的

概念。与时俱进是发现世界不同了,你要改变自己来适应它。它们跟与时俱进要划分严格的界限,否则就没有人格可言了。我的选择是与时俱进,但绝不随风起舞。我想做的事情就是把中国文学与外来文化的关系写下来,把它对今天的世界、对国家文化发展的意义搞清楚。不然会让我们国家脱离世界的发展,脱离文化的对话,脱离世界新的文化平台的形成和精神世界的改革。

我对比较文学的追求可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必须研究西方文学。这实际上是影响研究,是文学关系的研究。在这种思想影响下我做了好几个大的“工程”:一个工程是花费很大功夫和其他几位学者共同主编了《世界诗学大辞典》,钱钟书先生很赞赏这个工作,他亲笔题写了书名“世界诗学大辞典”。我全力以赴,几千个条目找了那么多人来写,但我自己写的很少,也就两三个条目。这个工作我认为是值得的。后来好多人还想在这个基础上增补词条,再做发展,因为这个词典还是有用的。我还策划了一个“中学西渐丛书”,总结了中国文化在国外到底是什么现状,到现在首都大学出版社已经出版了八本,还得了2007年中国出版政府奖提名奖。

陈:这也符合目前国家推行的“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文化政策。

乐:嗯,这是最早的走出去,丛书里诸如《伏尔泰与中国文化》、《白璧德与中国文化》、《庞德与中国文化》探讨的现象是在早期外国为什么看重中国文化,哪些方面对他们有启发。我们做的个案都是西方顶级的人物,像伏尔泰、莱布尼茨,都是在西方学术思想史上赫赫有名、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他们并不懂中文,对中国知之甚少,他们如何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中国文化如何就对他们的思想起了作用。并非一个人必须懂中文,看很多的中文典籍,中国文化才能对他产生影响。也许中国文化中的某一点触发了他们,然后他们就从这一点想开去。庞德也不懂中文,可中国的古典诗歌就对欧洲的意象派诗歌运动起了这么大的作用。这些现象值得很好地总结。我们怎么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拿出去。跨文化的理解里面可能有误读,也可能了解得不深入,只要中国文化对他们有启发、有触动。

陈:而且这也能说明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的建构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乐:对。以前我们讲两个文学的影响,中间必须有交集。就像叶维廉所说,两个圆中间有交集交汇的弧形,这才叫影响。其实我觉得影响很难讲。有时候这个交集并不存在。有时候这两个圆擦了一点边,然后就各自离开了,并没有形成两个圆交叉交汇的部分。两个圆擦边以后就按照自己的轨迹去发展了,可是这两个圆的擦边接触以后就形成一个新的场(field)。这跟两种文化完全没有接触是不一样的,它们各自从场里面得到了一些新的因素。我觉得莱布尼茨、伏尔泰就是这样,擦边的一点儿东西影响了他们,伏尔泰从《赵氏孤儿》就生发出《中国孤儿》,布莱希特的《高加索灰阑记》直接借鉴了元杂剧从中引发出来,从一点儿引发出另外一个主题,另外一个思潮。我觉得影响研究应该扩大到这样的研究上面去。不然,坚持两种文化交叉的地方一定要有翻译,一定要有很多的接触,这样的影响是很窄的,应该有所扩展。

陈:就是要突破传统的影响研究的模式来看待两种不同文化的相交和碰撞。您刚才用的比喻让我想起本雅明在《译者的任务》中的切线之喻,他是说原作和译作好比一个圆与一条直线只在某一点相切,然后各自发展开去。也是像您说的,原作和译作因为这样的相切,尽管各自发展,也是不一样了。原作的生命也改变了,因为他说译作是原作的来世生命(afterlife)嘛。我们谈世界文学的时候也需要有这样的思维,世界文学的原作

(original work) 原本只是一个自为的存在,当它有译作(translated work)后,它就从另一种语言里面获得一次新的生命。

乐:所以谢天振他们做翻译的一直说,文学史也应该包括翻译的文学。我觉得也是对的。我这一阶段还有一个工程是“跨文化个案研究丛书”,从中国现代文学来看怎么受到西方文学的影响,有梁实秋卷、冯至卷等15卷,一直做到90年代还在做。

我的学术研究第二个阶段就是提出新人文主义。从1998年左右我就开始关注新人文主义,1999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6届年会上的发言是“21世纪与新人文精神”,到2004年在香港召开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17届年会时对新人文主义的想法比较成熟了。我觉得比较文学不光限于文学的研究,应该对人的灵魂和精神起作用,要用一种新的世界性的精神来教育人。文学的研究应该更多关心人文的发展。可以参看我香港大学的发言。我对新人文精神的理解是,首先要有新的历史观,摆脱物质增殖、人类中心主义的现代发展观,塑造“可持续性文明”。个体不再是盲目追求自由,要走向有责任的深度自由。人类的发展要超越工具理性,呼唤审美智慧自由。如果说欧洲18世纪的第一次启蒙以追求理性和普遍性为中心,那么21世纪的新人文精神提倡的是东西方文化的互补,尊重他者和差别。从这个角度出发的话,文学就不应该只是精英的,关在象牙塔里的欣赏。

90年代有很多人讨论,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感时忧国”,有一批人就反对,说中国知识分子就是被“感时忧国”搞坏了,忽略了个人的创造,忽略了个人生活的影响。文学因此成为一种工具,而非个人灵魂的抒发。这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因为文学的确是个人东西。可是如果把个人与社会道德和社会使命割断的话,文学就成了个人的欣赏、享受、把玩,成了个人的小摆设、小玩意儿,跟别人没关系,不能要求它有社会的义务和关怀,一要求就变成千篇一律,就变得没有个人性,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种说法。我是赞赏鲁迅这样的,文学要对大众起作用,不光是自己玩赏。文学不对他人发生作用,对国计民生完全没有影响,只是关在象牙塔里的孤芳自赏,就没有社会价值了。不过我不反对文学的个性化,文学脱离了个性也失去了它的特色,但即使个性化的文学也必须和周围的人有关系,要有历史担当。

文学比别的东西好就在于它能够沟通人的灵魂,这就是新人文精神。这正好说到我的学术研究的第三阶段,即911事件以后。911事件时我正在新加坡做一个吴德耀讲座,完了以后我受邀去美国斯坦福大学讲了半年的《中国现代文学》。911事件以后,我对美国人有了一个非常不同的看法,原来我认为美国人就是讲求金钱、物欲、个人主义,凡事以个人为出发点考虑问题。911以后美国的爱国情绪非常高涨,很感染人。当时我斯坦福的邻居每家都挂着国旗,都在谈论这件事,变得很爱国,似乎他们都认为一定要全国一致地来对付恐怖分子。

那时候我就在考虑,以后历史该如何写呢?以前我们认为美国人很个人主义,但一到危及国家民族的关键时刻,每个人都会奋发起来。连我的邻居老太婆都非常激动,要献出一切,物化的、个人主义的东西消退了。即便爱国是主潮的中国,现在能为国家利益舍己为人、有担当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后来我就在考虑比较文学新的问题,不但是新人文主义要发动起人对世界的担当,而且要考虑世界多元化的问题。

多元化在2000年前后曾提得比较重,911以后成为我考虑的核心问题,多元化意味着西方国家得考虑阿拉伯的问题,这个问题是被逼出来的。阿拉伯国家有它们的缺点,但

也有它们存在的理由。意大利的艾柯提出要发展民族的多元文化,多元文化不是一个大熔炉,把各种文化变成一个合金,而是要保持自己文化原汁原味的特点和价值。我觉得他说得很对。前两三年斯皮瓦克也提出反对文化强势国家对弱势国家的“挪用”,反对精神殖民的传统。我们过去很少考虑精神殖民的问题,可是这个问题在1996年就被一个罗马大学的教授阿尔蒙多·尼兹(Armando Gnisci)说过了,他在长春的第五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发言,说比较文学是一个“反抗精神殖民的学科”。这个说法让我当时特别惊醒。我现在再把他的文章翻出来看,觉得他把很多问题都说到了,他的意思跟斯皮瓦克是一样的。他说有两个层面的比较文学,对那些被殖民的人来说,比较文学可以帮助他们解脱精神上的殖民。我们崇拜欧美,觉得人家的东西都是好的,就是精神殖民遗留下来的问题;而对于曾经殖民别国的人,比较文学对于他们是一个很痛苦的苦修(askesis)过程,必须要看到今天已经不是殖民的时代了,我们要和那些曾被殖民的人共生、共处,所以必须去理解他们的文化,成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比较文学之所以是一个反精神殖民的学科,从殖民者来讲如此,从被殖民者来讲亦是如此。今天只有反对精神殖民,形成一个平等互利的文化共同体,才有能有合作。我多次引用他这个说法,比较文学是一个反精神殖民的学科。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如何保持自己文化的原生态,保持文化原有的价值,但是又不是直接回到原生态文化不变,而是从核心价值出发,加以现代化和现代的诠释,在这个基础上和别的文化对话。然后,把自己民族的文化提升成一种现代文化。这是我最近十年来一直在做的,而且我也认为这是比较文学最核心的问题,最根本的任务,一言以蔽之,就是全球化中的多元化怎么进行。

也就是从这里开始我做了《跨文化对话》杂志,它的历史也十年了。必须有文化间的对话,而文学是最好的载体。其他的如哲学、法律、政治、宗教都是赤裸裸说理,要不你听我的,要不我听你的,只有文学是可以协商的,可以沟通人的灵魂的。在文学中人和人是可以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互相对话的,就是从此时开始我们提出,比较文学就是跨文化的文学研究。为什么要提跨文化的文学研究?因为只有跨文化的文学研究才能沟通各种不同文化的根本价值,从而互相对话,比较文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我为什么一直讲法国的于连,他今年也来参加了上海的年会。于连的思想强调的就是文化必须要沟通。沟通就必须先从自己文化的圈子里跳出来,所以他那篇著名的文章《为什么我们西方人研究哲学不能绕过中国》讲的就是这个问题,要了解自己必须从他者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做到呢?前提就是每种文化要保持它原来的文化生态。如果它已经被别文化同化了,被殖民了,它就失去了自己。像艾柯说的,它在文化的大熔炉里变成了一块合金,自己的特点没有了。所以,这个问题是2000年以及911以后我思考的一个核心。各种文化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中如何保持自己的特色和文化生态,不被同化和殖民,各种文化如何在沟通和对话中共处,如何构成一个世界文化的共同体。在这个过程中,文学的确是一条重要途径。

陈:您提到的阿尔蒙多·尼兹,以及斯皮瓦克他们所说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多元化问题,我感觉他们的理论资源比较多是来自于后殖民思想。你是否认为,在多元文化的讨论中,后殖民提供了支撑性的理论立场呢?

乐:我想是可以这么讲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在后殖民时代出现的问题,旧的殖民体系

崩溃后,我们应该怎么生活。全球化已经不可避免,我们应该怎么办。可是我不愿意把某个思想一定冠上某种思潮、某种主义的帽子。后殖民主义本身也有很多缺点。后殖民是与后现代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离散的,反对一切权威的,反对本质主义的,反传统的,可人该如何生活呢?人与人总是要有关系的吧。

陈:您是说还是应该有一种建构性的思想,然后“挪用”后殖民可以为多元文化发展起作用的资源?

乐:为什么要“挪用”一种理论呢?我觉得应该这样就是这样啊。做学问是从问题出发研究问题,不一定要把研究套在理论的格式里,你也应该避免这样的思路。合适就用,不合适就不用。这样做才能做出中国自己的特点来。如果做学问像做蛋糕一样一定要搁在哪个模子里,根据模子来做,那做的学问和蛋糕一样总是一个样子,要么圆的,要么三角形的。如何有突破呢?比如后殖民主义的反传统我就不同意。我们的文化是从传统下来的,传统的核心价值不应该抛弃。我们为什么要谈论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的离散性和碎片化使得人无法生活,人和人总得有某种关系和结构,所以西方也有人开始谈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提倡文化的共同体,尊重多元文化的传统价值。他们特别提到,他们所说的后现代的价值与中国前现代的价值有很多可以结合的地方。譬如中西医的关系,西医是从分类出发的,中医是从统一出发。照西医来看,身体哪个地方坏了对系统没好处,就把哪个地方切掉。中医视身体为一个整体,不是从分类来看,而是讲整体的协调,所以中医有很多地方值得西医学习借鉴。加州 Sacramento 大学的教授 Junior Cobb 讲了很多这样的东西,认为后现代的价值与中国前现代的价值有很多可以相通的地方。

陈:我们另起一个话题,我听说您“八零后”的一个工作重点是要撰写一部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可以大概谈谈您的构想吗?

乐:我不是想写一个很客观的历史,我写的是我个人对这一百年的理解,这是从个人立场出发的。以我个人之力,已经无力去概括这一百年这么丰富的历史内容了,所以只能写我所理解的这个百年史。恐怕就和今天我跟你讲的我个人治学的三个阶段有关,它的发源和起源,从我这里是怎么起源的,也会旁及别人的一些情况,不是完全封闭地讲自己,然后就是讲各个阶段一些标志性的东西。

陈:您刚才比较集中谈的是 70 年代您回北大之后的历史。那么这之前的中国比较文学的情况呢?

乐:中国的比较文学的起源和法国、美国都不一样,它在诞生之时就是一个跨文化的研究。当时中国面对着西方,所谓比较文学是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文学。这跟法国比较文学在欧洲中心的一个文化里的发展是很不一样的。这也是杨周翰先生一直强调的,中国的比较文学不是课堂里产生的,是跟中国社会、跟中国寻求发展的道路结合在一起的。它是社会性的,而且它不是一个文化内部的,是跨越了中国和非常不同于中国的西方文化的比较研究。中国比较文学从一开始的来源就不一样。早期的中国比较文学史可以写王国维、陈寅恪等人。

陈:您在福建人民版的《比较文学研究》里的前面几章就专门写了这些早期人物。我受惠非浅,我的课堂讲解专门纳入了您书里的这些内容。在我看来,大部分比较文学教材在讲中国比较文学时直接从 70 年代港台“中国学派”开始是不对的,早期的比较文学历史为什么不谈,这段历史不仅精彩,大师辈出,而且与后来的比较研究完全不同。您那本

书正好填补了这块关键的空白。如果您写百年中国比较文学史,还会再写这一段吗?

乐:绝对会写,这既是开头,也是重点的一段,别人讲的也比较少。就像你说的,都是从后头讲起,顶多从三十年代清华大学吴宓的“中西诗之比较”课、瑞恰兹的“比较文学”课讲起,可是这之前还有二十年非常精彩的历史。从当时的报刊杂志可以看到,新小说传入中国后引起的各种影响,太丰富、太有价值了,值得我们去做一些总结。我要写的话要找一学术助手,帮我理清楚,到底当时小说怎么就变成了新小说。这当中林纾起了很大作用,林纾每本翻译小说前面的序,都是比较文学。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阶段。第二个重要阶段是三十年代,这段当然也很重要,比如宗白华、朱光潜他们做了大量的工作,更晚一点是三、四十年代钱钟书的《谈艺录》的出现,还包括梁实秋等很多人都做了比较文学新的开拓。但是我们的历史书写还是缺乏,研究得很少。

陈:三十年代是作为一个有正式的学科建制的历史来讲的吗?

乐:对。可是比较文学不应该限制在这个年代,三十年代之前是重要的发端。在这个发端之后,三十年代才是发展。清华也不是唯一的。北大朱光潜关于东西诗学比较的《诗论》是非常有比较精神的。钱钟书的《谈艺录》更是比较文学的,这是《管锥编》的前身。总之,三、四十年代的人和研究都异常丰富,却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我和王向远合作《比较文学研究》时出版社催得太急,做得很粗线条,不理想。然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二十年的沉寂。可是这不是真正的沉寂,当时我们跟前苏联有很多联系,法捷耶夫当时也很流行,也可以探讨革命政党的革命文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像萧军《八月的乡村》就大量吸取了前苏联的影响。而且前苏联的文艺政策,像日丹诺夫的东西,怎么对中国发挥了消极的影响,这些都可以写出很精彩的比较文学研究论文。“革命文化中的比较文学”,这是没什么人做的研究题目,可能做起来不太好玩,可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

二 中国文学的世界化视野与跨文化对话展望

乐:新中国比较文学是从何时开始呢?1980年7月有个外国文学的年会在成都召开,会上杨周翰、季羨林、李赋宁三位教授呼吁比较文学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将来值得研究。在成都会议之前,1980年夏天,季先生、杨周翰找到了我,打算成立一个“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1981年1月研究会正式成立,这是有据可查的,记载在第一期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通讯》上面。季先生任会长,杨周翰、李赋宁先生任副会长,我是秘书长,这应该是中国比较文学的萌芽,不过还没有站定脚跟。我按着三个教授的意见帮着到处联系,找材料,出刊物,可我是跑腿的,不是主导的。我最怕别人提我是比较文学的创始人、奠基人之类的,因为不符合历史。

1983年6月才是天津会议,它的确是第一次全国性的比较文学学术讨论会。但更具规模、而且是国际性的比较文学学术会议是两个月后1983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这是中国比较文学第一次露脸。1983年我在美国,没有参会。这次会由钱钟书主持,中方会议代表有王佐良(团长)、季羨林、杨宪益、杨周翰、许国璋、袁可嘉、钱中文、周发祥,以及张隆溪、赵毅衡,美方会议代表领团的是孟而康(Earl Miner,团长),还有刘若愚(James Liu)、白之(Cyril Birch)、欧阳桢、余宝琳,都是比较文学的大牌教授,这次会议很盛大,讨论得很精彩。《中国比较文学年鉴》上记载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奠定了中国比较文学的基础,中美两边学术界的顶级人物都来支持比较文学。

当时我不在,也没起什么作用。

这么来看,天津会议算不上中国比较文学的开始,之后奠基性的“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打开了中国比较文学繁荣发展的一个绝好局面。可是1983年以后中国的比较文学事业就沉寂下来,没有人接着搞,说白了就是没有跑腿的做具体的工作。

陈:看来没人做具体工作,好局面也是难以为继的。然后就是1985年吗?那真是中国比较文学值得书写的一个年份。

乐:是呀,1985年10月29日在深圳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我组织联系了36个大学和研究机构,每家出两百块钱,开出一个全国性的大会。这里面需要做很多工作。比如,拿不到国家批准成立学会的批件,这个会就开不成。为了拿到这个批件,我真是哪儿都跑了,到处求人,我从来没这样求过人。这个会在深圳大学召开也是个机缘,在北大这件事是肯定干不起来的,因为“保守势力”很强(笑)。

陈:可能因为深圳不仅是经济特区,文化上也比较开放?还有您曾提过当时深大校长很支持。

乐:罗征启校长非常开放,他很希望在深圳大学打开一个新局面,当时他找人组系,我任中文系系主任,李赋宁教授任英文系系主任,我们都是兼任,算支援深圳大学。李赋宁先生也是非常想开创一个局面的,在文学研究上他也是一个很先进的人物,我们俩在从北京到深圳的火车上经常交流。关于开年会的事情,我们商议,要开就应该开全国性的,然后就串联吧,跑了好多地方,还写信联系。很多地方的人都很赞同,那就开吧。可当时我们还没有拿到批件,很着急。

陈:你们是在开会之前多久拿到的批件?

乐:大概是开会前一个月拿到的,把我急得没办法。我们是怎么拿到的呢?我找了季先生。他本来就很支持这个会,他也主张一定要成立学会。为了这个小事他找了胡乔木。胡乔木也不能直接命令民政部同意批准我们的学会,他就去找了他管辖下的国家体改委,就等于现在的国务院发改委,体改委当时就批了。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是36个学校和研究机构跨省的集体组织,这在当时是没有的,是开创性的。再来呢,这个学会是由体改委批准的,体制改革嘛,说明学会是很先进的组织。这是最精彩的一笔,居然通过了,居然赶上了。

美国杜克大学的詹明信(Fredric Jameson)和当时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马(Douwe Fokkema)都来参加了我们的会。我们一方面开成立大会,一方面在开会之前的10月13日到28日开办了一个很大型的全国讲习班,学员有快两百人。讲授的专家来自美国、香港、北京、上海,比如詹姆逊、艾德礼(Aldridge)、叶维廉、袁鹤翔、刘君若、李达三(John Deeney)黄德伟、胡经之、陈力川、许子东等。

陈:那首届年会就是国际性的?这个起点很高啊!

乐:对,是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孟而康他们都来了。

陈:那这次会一点都不比1983年的中美双边讨论会逊色。

乐:除了美国的,像欧洲的佛克马、谢夫莱尔(Yves Chevre)都来了,范围更大吧。我就感慨,一个东西的起始是很奇妙的,很多机缘凑在一起就成了,缺了一点都不行。如果没有36个单位愿意,每个单位都有一两个热心此事的人,这件事就做不起来。1985年的这次会仅凭一个人是做不成这样的事的,一个人的能耐有限。

陈: 不管怎么说, 1985 年的首届年会可以说是中国比较文学史上敢为风气之先的一次创举。这次年会之后您在深大还做了什么呢?

乐: 我们在深大, 汤老师成立了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 我成立了比较文学研究所, 当时在东南亚颇有名气, 好多人想来报名学习。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企图心, 想把深圳大学办成东南亚的教育和学术中心, 专门吸收华侨子弟和东南亚的人。后来风向突变, 市政府忽然下命令说, 深圳大学培养的人才为深圳服务, 教那么多外语, 学那么多文学, 有什么用? 罗校长和我们商量, 没有办法我们就改变了培养人才的方针, 要培养最合规格的、最有现代文化的秘书。第一他/她要会开车, 第二他/她要给首长做翻译, 第三他/她笔杆子要硬, 写个报告什么的写得顺畅。当然其中我们也把要懂得世界文化灌输进去。

陈: 有点暗渡陈仓的意思。如果总结这段历史, 可不可以这样说, 深大做得这么轰轰烈烈的比较文学学术事业, 后来被政治方面的争斗给牺牲掉了。

乐: 给压垮了。此后深大那边的比较文学事业就算结束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 不是没有人奋斗过, 不是没有人有好的创意。

陈: 接着您谈的多元文化, 您可否谈一谈世界文学。近年来世界文学的议题很热, 美国哈佛大学的达姆罗什教授提出了他的全球化的世界文学概念, 比如从流通、阅读和翻译的角度界定世界文学。我刚刚拿到的《中国比较文学》2011 年第 4 期“快乐的对话”你写下了对世界文学的一些思考。如同您对多元文化的看法, 您也认为世界文学也应该是不同的文学保持它的文学生态, 但可以吸取别的文学的营养, 在相互的对话和作用下形成一种文学的共同体。您还谈到了鲁迅、杨周翰、陈思和等人对世界文学的看法。您对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关系的说法, 我觉得说得挺好的, 动态中的世界文学是比较文学的对象, 没有这个对象, 比较文学就不能存在; 而比较文学是世界文学的前导, 是它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这样才能对世界文学做一种宏观性的研究。

乐: 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我觉得还不成熟, 还没有把握。

陈: 我当然同意您的说法。另外我个人是根深蒂固的精英主义的文学观, 世界文学当然应该是那些优秀的、经典的文学的荟萃。因为某个文学作品是少数族裔的, 是女性文学的, 就理所当然地要划入世界文学之列, 我对此持保留态度, 尽管这是目前相当流行的做法。我在想, 如果中国的文学作品要进入世界文学, 我们必然要贡献的是我们最优秀杰出的文学经典。人家不会因为你的作品是什么特殊身份的人所作, 就把你放到世界文学中去。您对此是什么看法?

乐: 我认为世界文学不要设什么门槛, 什么可以进来什么不可以进来, 谁来定这个标准和门槛呢? 从非世界文学到进入世界文学, 这也是个过程。经典不是天生就是经典, 是经过多少年的淘洗, 才成为经典。世界文学是一个总体, 这里面有不同的光谱, 有最前沿的、最好的, 经过经年累月的淘汰而来的。也有稍差一点的, 只获得一部分人认可。就算得诺贝尔文学奖的, 也不是大家都喜欢, 可也不能否认它们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所以世界文学是一个不同的光谱, 它纳入了世界各地的文学。它也不断地在进化, 最后成为经典。我之所以说世界文学是活的、动态中的对象, 就是这个意思。

陈: 世界文学就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 在形成之中, 像张沛他们的看法。

乐: 对, 不能把它固定起来, 说门槛以内的是, 门槛以外的不是。这就像以前我给你们上课时, 大家热烈讨论的诠释和过度诠释, 什么样的诠释是正确的, 什么是过度的? 说

《红楼梦》是阶级斗争的也好,四大皆空的也好,都可以接受,可是说《红楼梦》是一本侦探小说,就是过度诠释了,大部分人没法认同。所以诠释和过度诠释是有一个界限的,可是这个界限是什么呢?讨论课上大家很热烈地各抒己见,最后大概定下这样的界限:语言。能从作品的语言中分析出来的,语言本身能解释的,算是合理诠释,不能从语言里分析得来的、完全与语言无关的就是过度诠释,但是这样说似乎也不是太有定论。世界文学也像这样是动态的,一部非经典的作品可能突然因为某种原因就成为经典了。最近哈金的作品就突然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跻身世界文学。所以一部作品算世界文学的还是不算世界文学的,是自然形成的。比较文学则是一个方法和途径,是去研究、了解世界文学形成的过程。

陈:那么具体到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有些学者提出中国文学本身就有世界性的因素,我个人觉得这好像是要别人承认我们中国的文学天然就是世界文学,这里面裹挟着一种要自我证明的情结和焦虑。

乐:不用管这里面是否有什么情结,还是看想法本身是否合理。就我们自己的文学、精神思考和现实的生活来讲,世界性的因素都是存在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环境的破坏等等,我们和他人有很多共同的问题,共同的世界性因素。每一国的文学都会触及这些问题,这些就是共同因素,光中国有的那些不是世界性因素。我们不需要把中国有的东西硬挤进世界文学中去,我们容易和别人分享的是那些共通的东西。“中国文学有没有世界性因素”这个问题,《跨文化对话》会组织一次专题性的讨论。我的理解是世界性因素可能在不同国家的文学有不同表现,在中国有中国的表现。怎么在中国文化、文学里找到那些反映世界在共同地思考的东西,还可以再继续探讨。

陈:您多次来北语做学术报告和演讲,如2003年10月“多元文化与比较文学的发展”;2008年5月“西方的文化反思与新的中西相遇”;2009年11月“展望21世纪的比较文学”。北语的校训是“德行言语,敦睦天下”,这是季羨林先生2007年给北语写的。我个人的理解是德为先,不是暴力或强权为先,语言是辅助手段,目的是中外或天下的文化沟通。这里面已经内含着您时常所提到的文化对话中的“和而不同”。《中国文化研究》杂志以刊登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化的论文为主,这方面的作者群和读者群应该是主体。如果以他们为假想的听众,您觉得,中国传统文化要走出去,要和异质文化对话,最根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乐: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不要灌输。我们不能有这样的心理,中华文化很伟大,别人理应来学习和接受,再加上我们提出文化软实力,搞得外国人很害怕。我们的孔子学院和各种文化节总是比较停留在表面。我接触到的外国学者对我们输出的这些东西不太买账。他们觉得这不是他们需要的那种中国文化。文化本身是细水长流的,不能强加于人。应该慢慢的渗透,不能急功近利。我们做几个文化产业、文化工程表面上可以轰轰烈烈,但我们的文化没走到人家的心里去。

陈:您主张文化传播应该润物细无声,打动外国人的心灵?

乐:当然。而且应该让他们主动地来接受。我们接受西方的影响就是主动的,不是他们强加的。我们觉得他们的文化好,对我们有用,就接受了。我对西方学者的研究,比如研究于连、阿尔蒙多·尼兹、艾柯,就是看他们怎么看中国文化,或者再早一点看现代初期的西方人怎么看中国文化,其实这样的中西结合研究对西方人最具有说服力。我曾写过

一篇文章谈“西方文化的危机”,西方人自己发觉到他们文化的危机,才向中国学习解决文化危机可能的方法。上面我提到的这些西方学者,他们说的话对西方人就很管用。心灵的沟通才有用,才不是灌输。

我们的动画为什么做不出《花木兰》、《功夫熊猫》,因为我们不了解西方文化真正的根底,也不了解他们真正需要什么,我们做出的东西跟人家是有“隔阂”的,很难有世界性的反响。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首先就是要去了解他们,去分析为什么《功夫熊猫》这么受欢迎,它跟西方文化有哪些结合点。

陈:据说国内很多外国使馆都订阅了您主办的杂志《跨文化对话》,这份杂志已连续出版十多年,近30期了。《跨文化对话》里设计的一些主题讨论,大部分是西方和中国的学者都感兴趣,都会贡献一些特别的想法。他们的观点形成交锋和对话。既然是对话,您觉得这本杂志让那些外国读者更多了解了中国文化吗?是否达到了一种双向的心灵沟通?

乐:当初办这个杂志的宗旨,第一目标读者是针对国外懂中文的人、学者,我们杂志花钱的地方是每一期都向各使馆、各个有东方系的大学图书馆邮寄赠阅,像伯克利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所以每一期我们都有西方和中国的作者写稿,共同来讨论、交流一些比较新的观点。虽然也有读者来信要求订阅,可是因为杂志是以书代刊,没有刊号也不能订阅。我们寄到国外也不能通过正规的国际渠道,只能通过个人渠道的方式。第二,我们还出了四期法文本和英文本的杂志,中文的是一年三期,外文的只能一年一期。我们得到了一点经费,就从历年杂志里挑出最好的,译成法文和英文,出了四期。后来经费用完了,等再有经费还要继续出。我花了比较多的精力做这个杂志。可惜我们还没有正式的刊号。

陈:但是《跨文化对话》已经进入了很多学校的核心期刊目录,而且大家都知道,很多以书代刊的刊物做得很出色,在外面有口碑。

乐:除《跨文化对话》之外,同时我们还做了“远近丛书”。《跨文化对话》针对学术界的学者,“远近丛书”更大众一点,针对中学教师、学生这个层次的。以一个关键词为题,比如“梦”、“夜”、“味”,由法国人和中国人各写一本小书,法文版和中文版同时出版。

陈:这一出版就已经形成一种对话了。

乐:当然啦。汤一介和法国院士汪德迈各写了“天”,反映出中国人和法国人如何看“天”,很有影响。老汤还和一个法国科学家各写了“生命”,表达对生与死的看法,销得也很快。唐克扬和一位法国作家各写了“树”,叶舒宪写的是“情”。我写的是“自然”,写中国人对山和水的看法。最近“远近丛书”要组织写的是“仁慈”、“家”。这些系列还有意大利文版。阿尔蒙多·尼兹看到意大利版本,很感兴趣,他希望和中国合作建立一个南北沟通的网络,从北京到东京、罗马、里约热内卢,把南北沟通起来,因为已经有的多半是东西沟通网络。“远近丛书”也是我花了很多力气做的。找人写也不容易,必须找顶尖一点的,有威望的,有想法的,文笔好的。北大出版社已经出了四本。

陈:有乐门弟子称您在“立功”方面的成就大于“立言”上的成就,这么说您可能未必同意。如果可以打比方的话,我觉得您在“立功”上的成就体现于您有几个这样的孩子。北大比较文学所(1985—2011),中国比较文学学会(1985—2011),以及刚才咱们谈到的您主编的杂志《跨文化对话》。咱们先谈谈北大比较所,您对这个研究所是一个什么样的

设计? 您认为达到了这个目标吗? 北语的比较文学所与人文学院合并, 完成了机构和资源上的整合, 您对我们的研究所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建议?

乐: 我建比较所时, 心中的理想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研究所, 很受它的启发, 社会研究所当时是最前沿的, 它一直跟进最前沿的对话和理论的开展, 并且参与对话。作为研究所, 还必须要有一个刊物, 不断地报道研究所的思路和想法, 把大家的智慧聚集在上面, 包括老师和学生的思想。我觉得学生的思想也很重要, 他们往往是最新的, 最先进的, 做研究所首先是要培养学生。你们当学生时我也一直强调你们一定要跟上理论的最前沿。除了刊物, 还应该有一套丛书, 根据不同的专题总结研究所的学术研究成果。可以主动策划设计丛书专题, 比如我设计的“中学西渐丛书”。

研究所当然还要有好的师资队伍, 这个很重要。我创建北大比较所时, 缺点是把摊子铺得太大了, 这是我当初在设计比较所时失策的一个地方。我设计了四个方面, 东方文学研究是严绍璎, 欧洲文学关系的研究是孟华, 媒体电影等研究是戴锦华, 诗学是一个核心, 我很感兴趣, 主要做这方面, 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理论怎么走出去的问题。可是大家太分散了, 没办法形成一个拳头和集体的力量。

陈: 是否可以说取舍之间必然有得有失? 您的安排是四个方面的研究都有可以担当的人, 那么, 他们必然是不太一样的。

乐: 是的, 我当初的设想是各个方面各有一人, 但是后来人员也有变动。

陈: 有设想比没设想好吧。您这个设想应该是挺理想的一个蓝图。

乐: 太理想了!

陈: 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如果理想都不是很高远的话, 现实的实现就更不济了。您的建所理想和设计, 包括北大比较所的历史都是别创天地的, 应该对后来的人会有很多借鉴。

乐: 这方面的确还没人访谈和写过。是应该好好总结一下经验, 对以后办研究所的人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陈: 好, 比较所咱们先说这么多。您还有另外一个孩子, 中国比较文学学会。

乐: 学会是非常有意思的, 辐射到全国各个方面。我国最早的一份比较文学英文专刊是《文贝》(Cowrie), 孙景尧老师他们 1983 年在广西大学做的, 曾在国外有较大影响, 1985 年巴黎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法国学者艾田朴的大会主题发言给中国学者很高评价, 其依据便是《文贝》。《文贝》最初由广西漓江出版社出版(1984 年), 后来停刊了, 去年在上海恢复, 并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第 7 辑。孙景尧也出了很多钱让外国人来作翻译, 很不容易。我们有川军, 他们做出了很多成绩, 他们多年坚持做一个一年一期的英文刊物《比较文学: 西方和东方》(East and wes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做得很不错, 面对国外, 目前国内仅此一个。所以, 中国的比较文学有很多人在做, 不是只有北大, 只有乐黛云在做。

还有暨南大学以饶芃子为中心的对“流散文学”的研究, 在华人文学研究界, 可以说是执牛耳的。还有文学人类学, 自从长春的年会上叶舒宪提出来, 学会大力支持, 后来就办起来了, 他们出的东西非常多, 在国际上也很有影响。翻译研究方面, 谢天振他们的成就也是全国首屈一指的, 他们提出一方面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翻译也是对原作的一种叛逆。他还办了一个高级翻译研究所, 培养了大量口译的人才。学会

汇集了大家的成就,有各方面的人才,川军、沪军、粤军等等,所以每次开年会很多人来参加,分很多组发言。

陈:是呀,所以很遗憾不能听到每个组的发言。

乐:我在想将来是否可能分散着开会。比如诗学组第一年开会,第二年再有别的组。只是个设想,慢慢来吧。学会是个很大的组织,取得了很大成就。我们应该很早就新陈代谢,换领导班子。今年实行双会长制,我觉得是一个过渡。机构大了,面广了,领导就很重要,怎么把大家团结在一起,不要分散分裂,这是第一位的。

陈:学会里能人很多,要选出一个能服众的领导,确实不太容易。

乐: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慢慢的过渡时期。诗学方面,社科院的周启超、复旦的周荣胜都做得不错。诗学必定要发展,不管比较文学如何发展,最后归结点在诗学这里。

陈:您一直就扎根在这个最重要的根上面。

乐:可这也是我最薄弱的,应该能做得更好一点。像《世界诗学大辞典》,我本来想再深入到中国诗学,以别的诗学为参照系,把中国诗学好好整理挖掘一下。结果后来做别的工作,分散了精力。所以汤老师老说我,搞了半天,拿不出一个像样的东西出来。

陈:您应该是牺牲了个人的兴趣,做了大量的策划与协调“丛书”的工作。您为他人做嫁衣,汤老师很心疼。

乐:(笑)他写的东西现在可以出十卷本的自选集,我可没有十卷可出,只准备了一个“乐黛云小系列”,分四本,没有学术专著,只有学术随感集、书评书序集、散文集。我自己觉得学术随感也挺有意思的,很短小,三五千字,就一个问题谈。《中国比较文学》上“快乐的对话”专栏也属于这类。小系列里还有一本“评说乐黛云”,就是人家怎么评论我的。这个小系列大概今年年底或者明年能出版。

三 女性的对话:学术承传、女性角色与学术发展

陈:接下来我想谈点您以前所有的访谈没有谈过的一些话题。先好奇地问一问,影响您学术研究最深刻的一本书是什么?

乐:是勃兰克斯六卷本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我是从读这套书开始做比较文学的。它成为我的一个蓝本,它是一个断代的欧洲文学历史,牵涉到各个国家文学之间的关系,我想写的比较文学一百年就是这样的,对我影响很大。

陈:哦,真的?这我真没有想到。从一开始它就对您的学术影响很大,到现在您写比较文学百年史,它还是理想的蓝本。

乐:对。我想要做到它的那个深度,把各个不同的时代的文学关系写清楚。

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看来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提出的。那么,您觉得影响您的学术生涯最深刻的一位老师是谁呢?

乐:当然是王瑶先生和季羨林先生,最主要的是季羨林先生。王瑶先生教我做中国现代文学史,而后来我做比较文学影响较大的是季先生,他一直做中印文学比较,而且他眼界比较开阔。他给我写过的两个序言,对我影响很大。他对我评价很高,我也许不值得那样的评价,不过对我是很大的鼓励,让我坚信比较文学的路没有走错。一开始我就是跟着他走。所以说最大的影响,我想是他。

陈:还有一个问题,您自己的书里面,分学术类和非学术类两个系列的话,您最想为今

天的学术青年和学子推荐一读的书会是哪一本呢?

乐:非学术类的是《四院 沙滩 未名湖》吧。

陈:这本是很好看,我翻来覆去读过好几遍。

乐:学术类比较带有总结性质的是《跟踪比较文学学科的复兴之路》这本书,它跟踪了我的学术历史和思想变化。

陈:这本书真是收得很全,从您最早给《中国大百科全书》写的“比较文学”词条,到2010年写的代表性论文都收在里面了。

乐:可以看到我的学术思想的变化轨迹吧,我跟你说的三个阶段,从这本书都可以看得出来。包括我们刚才提到过的多元文化里的反殖民精神,都在里头。

陈:如果现在的学生想要了解您,或者了解整个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历史,读一读这本书会特别受益。

下面跟您谈的话题,是我特别设计的。我当老师也经常要为学生解疑答惑,今天的学生,女生占比例很高,这和当年我读乐门时男生占绝对优势有天壤之别。我并不愿意过多强调一个学者的性别身份,可现实情况是,女性学者走学问之路远比男性同仁遇到的问题要多,有些是纯做学术的问题,有些是与学术相关的生存问题。所以想问问您,作为一个女性学者,您是否认为,男性在思考方面、在学术研究方面比女性先天地有优势?有很多男士,包括受过高等教育的男士根深蒂固地这么认为。

乐:我不相信。

陈:我猜您的答案就是这个。

乐:(笑)我觉得人的大脑都是一样的。有人说女人擅长形象思维,男人擅长理性思维。但男人也有很出色的画家,女人也有政治家,像撒切尔夫人和我最不喜欢的希拉里,所以男女的大脑大部分是一样的,个别地方不同,但是不能说男女的思维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同。

陈:您是完全不同意这种身体决定论的。

乐:是的。现在女性在学术界,特别是文科,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可是女性为什么还是面临很多的阻碍。这些阻碍中我感觉最大的是女性要生孩子,我认为女人如果不生孩子是个很大的缺陷,至少应该生一个孩子,这是男人不能经历的、只属于女人的宝贵经历。我的学生在研究生时代如果想生孩子我是赞成的,她们顶多晚毕业一年。可是女性千万不能走全职太太的那条路,我在美国看到太多女性生孩子以后没人帮忙必须自己带孩子,就脱离自己的学术和工作,等到孩子上大学可以独立了,这些女性也回不到她们原来的学术事业了。学术的发展突飞猛进,如果在家带孩子不看书继续做学问,根本就跟不上。这时候这些女性很容易得上“空巢综合症”,孩子也不需要她们了,学术事业抛弃了,跟丈夫也无法在学术上对话和理解了,越来越陌生,如果再有年轻女性介入,就造成了家庭悲剧。我看到这样的美国家庭太多了。以前王蒙跟我聊这个事的时候,还说中国不会有“空巢综合症”,只有“满巢爆炸症”,可现在的确也慢慢开始出现这个问题了。所以我给学生最好的设计就是研究生时期生孩子,延长一年毕业,一年以后她们必须重新开始自己的学习,一定要拿到学位找到工作。那谁带孩子呢?男女合作,让丈夫分担一部分,这时候“啃老”一下也是可以的。等孩子两、三岁就送托儿所。

陈:您的中心意思是说,女性一定不能放弃自己的学术生命!我想现在的女性再困难

也没有当初您生孩子时困难吧。

乐:我其实不困难,我婆婆特别好,孩子一生下来就给她,我就干革命去了。我生第一个孩子时正是当支部书记红得发紫的时候,到处跑,所以第一个孩子生下来就给婆婆照顾了,那时我每天开会开到十一点。所以在儿女这边我付出的不多,我很后悔,因为我失掉了人生一段宝贵的经历。跟孩子在一起,看他呀呀学语,是最好玩的了。生第二个孩子后不久,我就下乡了。我觉得女硕士生、女博士生第一要自尊自强。不要以为自己矮别人一头,要不甘于当一个家庭妇女、职业太太。有的人觉得这样很舒服,日本人就是这样,中国也有人羡慕这样的生活。“书念得好不如嫁得好”,这样做人的话一辈子都完了。整天无所事事,像生了锈一样,没有自己的价值。第二,要善于分配自己的时间。家庭生活的时间、做学问的时间、锻炼身体的时间要分配好。第三,跟周围的人要处好关系。人际关系中不管跟哪个人处不好,甚至不喜欢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这种心结和心理负担会令人非常痛苦,精神消耗会非常大。这三点如果能做好,女学者一定是可以很杰出的。

陈:现在您身上应该冲劲和“沉潜”并存吧。您比我大整整四十岁,您那代人经历了非常动荡不安的年月,从新旧中国的转换、反右、文革,到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无不改天换地。严格地说,60后、70后这代人从八十年代开始才和你们一道同受时代的影响。我们这代人虽然小时候也吃了点苦,比如物质不丰富,但是没法跟你们所受的精神上的苦相比,也不可能像你们那样沧桑的经历,我略微懂事时文革都结束了。而年轻的80后、90后离艰苦岁月则十分遥远了。

今年乐门弟子为您举行的八十贺寿活动上我曾经讲过这样一个比喻:您那代人是青松,“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大雪就是严酷的环境,但是您们挺过来了。您和余华的一次对谈时说,您被打成右派还“挺着胸走路”,戴着花头巾“打扮得挺潇洒”,即使在极端残酷的环境下您也不赞成用自杀来捍卫生命的尊严。在我看来这就是青松的品格,而且,您还是乐天派的青松!60后、70后这代人大概像竹子,没吃过大苦,但是还有些韧性,遇到挫折还能挺一挺,不会一下子折断,但迎风傲雪的本事不及青松。80后和90后的一代,就是媒体所说的“草莓族”了,他们的生长环境像温室,没有吃苦耐劳的机会。他们当然也有他们的压力和精神痛苦,但是和您那代人比起来,应该说绝不是一个层次的。今年汤老师在您的寿宴上赋诗一首:

摸爬滚打在他乡,
翻江倒海开新章。
东奔西跑一梦醒,
转识成智觉有情。

这首诗的动词用得特别活泼,个中滋味值得再三揣摩。我也借着汤老的诗,祝老师的“八零后”事业蒸蒸日上!谢谢您接受我这么长时间的采访!

(作者通讯地址:陈戎女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100083)

(责任编辑 晓文)